

预测在中国与欧洲

朗宓榭

(爱尔兰根 - 纽伦堡大学国际人文研究中心)

在我们所知的关于德尔斐 (Delphi) 的皮媞亚 (Pythia) 的预言，最古老的来自于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 (Heraklit, 公元前520-460)。他与孔子 (公元前 551-479) 生活在同一时代，他写道：“德尔斐预言的主人既不表述，也不隐瞒。相反地，他提供预兆。” (ὁ ἀναξ, οὗ τὸ μαντεῖόν ἐστι τὸ ἐν Δελφοῖς, οὔτε λέγει οὔτε κρύπτει, ἀλλὰ σημαίνει, 残片93)。

古典时期的希腊将阿波罗神 (“德尔斐预言的主人”) 视为皮媞亚预言的灵感来源。当然阿波罗神是通过皮媞亚的嘴巴来“表述”的，但是所表述的内容并非一清二楚的“陈述”，而是以预兆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些预兆需要之后进行诠释，如果我们有能力去诠释，那么也就没有隐藏的秘密了。

实际上，赫拉克里特的话正描述了现代以前所有文化中的预测活动本质：得到预兆信息以后，为了认识未来，人们必须要对其进行诠释。从一个预兆中，我们可以组织出一个意思 - 但是，这也仅仅是我们的意思。因为预言本身既没有“表述”，也没有“隐瞒”。

德尔斐的预言在赫拉克里特以前就存在很久了，荷马就曾提到那里的阿波罗神祭祀。并且考古学发现也证明了那里公元8世纪以来存在的兴盛场景。比这时间更早的是中国的“易”，它以多种版本形式存在过，并且比孔子生活的时代也要久远很多。我们今天流传下来的《周易》，是延续至今的中国预测形式之核心。这一经典也包含着带有预言词的预兆。有句话叫“筮无定法” - 预兆总是和一个问题，一件具体事情联系在一起。按照《周易》里高度复杂的方法，人们可以得到一卦。而对这一卦的正确解释，却要求从一个完整的语义关系（也就是预兆本身！）中进行选择。（这里有着同中国文字的相似之处，比如汉字就包含着广阔的语义场）。

但现在我更想指出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德尔斐的预言从阿波罗神那里获得灵感；而中国的预言通过一个复杂的分离蓍草的过程形成，具体的操作方法在此我无法讲述。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方法以计算性，与数学过程（如分开蓍草）相挂钩为特点。这一特点在接下来的几百年中持续发展：越来越多的因素可以相互组合起来，五行，由十天干与十二地支组合而成的时间表述，当然还有卦之间的关系，爻与整体之间形成复杂的联系。张文智教授在他的访学过程中开展了关于不同组合技巧的定期授课，吸引了一批由访问学者和学生组成的听众。

到此为止，也许会有人莽撞地下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国预测以计算为基础，而西方的预测建立在先知的前提下。事实上这一印象，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否定的，至少是对高雅文化而言。在中国的民间，也存在有预感的人，巫师，通灵者（比如所谓扶乩），甚至儿童（以童谣的形式），他们也有很重要的作用；而在西方，抽签以及其它以类比和计算为基础的技术也从古典时期就产生了。但是当我们关注高雅文化现象时，那么这两种文化间的区别就马上映入眼帘 - 西方的占星术是个例外，但在此我无法展开介绍。当然这里的区别并不是“直觉”与“经验”的对抗。因为每个“预兆”都必须要有

被解释，而无论是在传统预测还是在现代科学中，“解释”都是离不开直觉的。

随着欧洲启蒙运动，从18世纪中期起，一种对于西方来说崭新的预测形式开始发展，这一技术的本质是依靠对可能性的计算为基础。（另外，可能性计算的兴起是和赌博联系在一起的，这也可以对我们理解当时人们对未来的向往有启示作用）。这样的技术虽然逐渐变的精细，但却有它们的弱点，这些弱点在这些年来格外显现出来：它们仅涵盖了高斯常态分布曲线的上部分，但却不能够顾及曲线两边部分的因素。比如柏林墙的倒塌，金融危机以及其它许多真正震动世界的事件。不管怎样，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中华文化创造了其复杂的，以计算为基础的预测术以后的几百年，西方才对这一形式有所认识。莱布尼茨对《易经》一书的兴趣正是与其紧密相关。

西方现代预测是以直线型发展为基础的。虽然以计算为依据，但正是因为这一特点以及追求明确性，使其陷入了危机。相比而言，传统中国展望未来的形式在不同层面上更复杂：比如，基本上《易经》中每个卦都可以转变成另一个卦 - 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复数的未来，也就是多个未来。它们召唤我们有更多的灵活性与谨慎感，一次又一次地将可能发生的巨大的转变及生活的不确定性展现在我们眼前。中国式预言让我们在不失去对未来好奇心的前提下更加谦虚。因为更加了解未来 - 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 - 是人类共同的愿望。了解人类在过去和今天怎样获取对未来的讯息，这是我们研究中心的目标，而我们与山东大学易学研究中心的合作则起了巨大的作用。

在另一个地方，赫拉克里特还说过（残片123）：大自然热爱隐藏自己。

(宋晓堃 翻

译)